

批判实用主义者詹姆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反动理论

陳 修 斋

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它的全部理论都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并反对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用主义者用来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宣扬个别人物决定社会历史的唯心史观，这是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科学理论直接对立的。早在1880年，美国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威廉·詹姆士，就在“哈佛自然历史学会”发表过一篇演说，题目叫做《伟大人物和他们的环境》，集中地宣扬了这种个人决定环境、决定社会历史的反动理论。后来又写了一篇题为《个人的重要性》的文章，是那一篇演说稿的补充。两篇文章都收在他的以《信仰意志》为书名的论文集中。这种反动的唯心史观虽然也是许多剥削阶级的代言人所共同宣扬的，并不限于实用主义者，但詹姆士的这两篇文章，则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并且运用了实用主义者所一贯运用的诡辩伎俩，企图为这种观点提出一系列“论证”，从而集中地、鲜明地暴露出了这种理论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因此在宣扬这种反动观点的文献中，有着典型的意义。并且我们看到，詹姆士在这里所宣扬的这种观点，以及他用来“论证”这种观点的那些诡辩手法，至今都还不仅为帝国主义者所利用，并且也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因袭。因此，彻底批判詹姆士的这套反动理论，折穿他那一套诡辩的鬼把戏，对当前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清除现代修正主义影响的任务，也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哈利·威尔斯在《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一书中，曾经成功地揭露了实用主义者在几乎所有各种问题上所惯用的一套手法，就是这样一个“三步论证”的方法：第一步，借攻击绝对唯心主义或传统的某种其他理论而实际上来攻击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基础；第二步，就以实用主义的、也就是“方便主义”的“原则”，来代替真正的科学原则；然后，第三步，再以多少不同的方式实质上恢复了先前的神学或唯心主义的内容^①。我们看到，詹姆士在论证其个人决定历史的反动观点时，所用的也恰恰是这样一套手法。他也曾以反对某种历史的“宿命论”为幌子，而实际上根本否定了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代之以实用主义的“偶然性”的原则，而最后则实质上以多少不同的方式恢复并宣扬了一种历史宿命论，来企图达到他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在玩弄这“三步论证”的诡辩手法的过程中，他也提出了一系列反动的、反科学的论点。为论述方便计，本文就以这一“三步论证”作为线索，来揭露和批判他的这一套反动观点和诡辩手法。

^① 参阅哈利·威尔斯：《实用主义》，1955年，三联版，第45—46页，第163页以下等处。

(一) 借攻击“宿命论”来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詹姆士在宣扬其个人决定历史的反动理论时，也是玩弄一贯的手法，首先借对某种错误理论的攻击，来显示自己彷彿是合乎“科学”的，并在这样的幌子下，来企图攻击真正的科学观点。这里，他为此目的而选作攻击目标的，一个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即所谓“社会有机论”，另一个是斯宾塞的門徒亚倫（Grant Allen）所主張的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他是把它们当作一种“宿命论”来攻击的。

首先，詹姆士借对斯宾塞派的理论的攻击，来企图根本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在《偉大人物和他們的环境》一文中，詹姆士写道：“……我将用一种错误的說法，来衬托出我自己的說法是真理，那种错误說法，是包含在斯宾塞和他的門徒們的哲学中”。接着他指出他和斯宾塞之間爭論的問題和根本分歧，就在于詹姆士認為，使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因“是由于許多个人、他們的榜样、他們的創导、和他們的決心的积累起来的影响”；而斯宾塞学派則認為“这些变化是与人物不相干的，并且是独立不依于个人的控制的”，它們是由于“环境、境遇、地理、祖先傳下的条件”等等其他条件所决定的^①。

詹姆士对斯宾塞派的論点大加攻击，他嘲笑这种論点就好象是把一个人滑了一交因而跌死的原因归之于半年前十三人同桌吃飯，或說一隻麻雀之被小孩用石子打死而墮地，其原因是在于銀河中的某种情况一样可笑。总之，他認為斯宾塞的理论，是一种“要完全認識任何一件細小的事物，都必須要知道全宇宙”的“濫調”^②，是把一件具体事物的原因，归之于大而无当的空泛的抽象的东西，“而在这大而无当的命題的空泛中，我們喪失了具体的事实和联系，而在一切实际的事情中，具体的联系是唯一重要的东西”^③。

我們知道，斯宾塞是所謂“社会有机论”的創始人之一，这种理论把社会比作一个象动物一样的有机体，把工人阶级比作动物机体的营养系統，而商人和工业资本家則为其分配系統和调节系統，并認為人类社会也当和动物机体一样服从生物学的規律。他并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工人阶级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是破坏了“均衡”，是“違反自然規律”的。因此这种理论是为資本主义辯护而直接反对工人阶级的。斯宾塞和馬克思恩格斯約略同时，他的理论也是直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詹姆士在这里所引述的斯宾塞的观点，也正是根据他的“社会有机论”而来。由于斯宾塞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因此認為一切社会現象彼此之間，乃至和自然环境之間，都是有机地联系着，并且是服从着一定的規律的。只是他所說的規律，其实不是真正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客观規律，而是生物学的規律。斯宾塞的理论的反动性和錯誤不在其承認社会发展具有規律性，而在其对这規律本身的歪曲。但詹姆士完全不是反对斯宾塞对社会規律的錯誤看法，而恰恰是借此反对社会历史的規律性本身。因为詹姆士在对斯宾塞派大肆攻击之后，就得出結論說：“因此，說什么‘历史的規律’，把它作为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科学只要去发现它，它的后果任何人都可以預言，但絲毫不

① 《信仰意志》，1927年，紐約，英文版，第217—218頁。

② 同上，第216頁。

③ 同上，第219頁。

能改变或避开它，这是愚妄的”^①。

我们看到，詹姆士在这里所玩弄的手法，首先就是把“大而无当的空洞的命题”和科学的抽象原则混淆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也是实用主义者一贯使用的一种诡辩伎俩。在这样加以混淆之后，他就进而认为一提抽象的原则，就会“丧失了一切具体的事实和联系”。詹姆士就想这样来把自己装扮成“讲求实际”，“尊重事实”，并借此来反对抽象原则。但这完全是徒然的。

当然，我们决不能仅仅满足于知道或承认例如“一切事物有着普遍的联系”，或“全部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而应该对各种事物和历史事件作具体的研究。具体分析具体矛盾，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是一切科学的研究工作所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但问题在于：我们在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时，是一刻也离不开从客观实际的各方面现象中概括出来的普遍原则或普遍规律的指导的。这种规律或原则，唯其是有普遍性的，概括的，在一定意义下也就必然是抽象的，但并不因为它抽象就是不正确的，正相反，如列宁所指出：“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②。象“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历史的规律性”这些原则，就正是列宁所指出的这部“科学的抽象”，它们诚然是抽象的，但却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的，并且是一切对自然或对历史的研究首先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怎么能把它说成就是“大而无当的空泛的抽象的东西”而加以否定呢？如果否定了这样的原则，把自然事物或历史事件都看成只是一些彼此孤立、毫无联系、毫无规律的偶然事物的堆积，则要对任何一件事物作出正确的、科学的说明都是不可想象的，任何科学也都将成为不可能的了。实用主义的观点，就正是这样彻头彻尾反科学的观点。

如所周知，反对抽象原则、反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规律性的观点，本来是从贝克莱、休谟以至马赫主义以来整个所谓经验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潮的一贯主张，实用主义的全部理论，也是属于这一流派。詹姆士在这里的观点，也只是他的整个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理论的一种应用而已。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经典著作中，早已给了这种理论以毁灭性的批判。以尊重“经验”、尊重“事实”为借口而根本抛弃原则性，这特别是实用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突出特点。而我们看到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正是以攻击“教条主义”为幌子而实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的。“无原则性”，这就是实用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之一，也正说明现代修正主义和实用主义恰恰是一丘之貉。

其次，詹姆士又以上述同样的手法，借对某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攻击，来企图根本否定整个关于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面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而为宣扬个人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开辟道路。

詹姆士在这里选作攻击目标的，是斯宾塞的门徒亚伦的观点。亚伦在一篇论文中主张：“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区别，……简单地并且唯一地依赖于他们被安排在其中的物理环境”^③。又说：“这种分化的动因必须在土地和海洋等伟大的持久的地理面貌中寻找

① 《信仰意志》，第244页。

② 列宁：《哲学笔记》，1956年版，第155页。

③ 转引自《信仰意志》第235—236页。

……”①虽然他下面又把“物理环境”叫做“物理条件”，并且对这一名称的含义作了些别的解释，但基本上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无可怀疑的。他并且说：“假定不是这样，就是假定人的心灵可以不受普遍的因果规律的支配”。詹姆士对此大表不满，认为这简直“叫人不可忍耐”②。他的反驳的理由，除了引证他人的著述，说明地理环境相似而各民族的社会面貌可以大不相同之外，主要的论证是说：地理环境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至于造成社会的特点的“充分条件”，则是“有关在个人中发生的生理学上的偶然性的事”③。而詹姆士的鬼魅伎俩，在于把亚伦所说的“物理条件”，一下偷换成“整个自然”，因而把对亚伦的观点的攻击，一下转变成对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攻击。他说，“亚伦所说的物理条件，如果是指整个自然，则他的主张，虽然是真的，却只形成那种空泛的亚洲式的信仰无所不包的命运的說教”，就是一种“宿命论”，这在他看来是用不着“多费笔墨”去作什么认真的批判的。

对于詹姆士自己所提出的决定社会面貌是什么的正面主张，我们留待下一步再作批判。现在先要加以分析的是他对亚伦的反驳。

如所周知，亚伦所主张的那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当然也是错误的。因为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地理环境虽然也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之一，而且也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发展要比地理环境的改变快得不可计量。认为“地理环境”决定历史发展的观点，归根结底仍旧是掩盖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客观规律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但马克思主义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和詹姆士对它的攻击是站在相反的立场上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为了正确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而詹姆士对它的攻击，则是企图借此攻击关于社会历史的一切唯物主义的解释，是借此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本身。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毫无根据地把亚伦所说的“物理条件”，一下就偷换成“整个自然”，从而根本反对从“整个自然”出发来说明社会面貌。应该指出，“整个自然”这个概念，并不只是指无生命的、乃至除人类社会以外的整个自然界，詹姆士明明指明它是一个最广泛的“无所不包”的概念，实质上就等于整个“客观存在”。詹姆士之反对以“整个自然”来说明社会面貌，并不只是反对仅仅以自然的原因来说明社会现象的错误观点，而是根本反对从客观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的。照他的观点看来，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乃至更普遍的“存在决定意识”这种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亚洲式的信仰无所不包的命运的說教”，就是“宿命论”，是“不值一驳”的。这才是他攻击亚伦的观点的真意所在。但詹姆士的这套把戏，除了进一步暴露自己反科学、反动的真面目之外，当然也只能是枉费心机的。因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当然丝毫也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任何宿命论毫无共同之点，而是正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根本原则出发，肯定社会历史是按照不以任何个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发展的；具体地说，是肯定社

① 转引自《信仰意志》，第236页。

② 《信仰意志》，第237页。

③ 同上，第239页。

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面貌，并因此肯定了历史首先是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者即劳动群众的历史；是他们的生产斗争实践和反对各种剥削者和压迫者的阶级斗争实践的历史，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肯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并肯定个别人物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可以有伟大的作用，只是个别卓越人物之所以能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则正在于他能够掌握与运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要求，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一个脱离人民群众，违背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要求的人物，要想逆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行事，即使由于窃据或强占了某种特殊的重要地位，也可能得逞一时，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延缓或促退的作用，但到头来终究没有不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的。总之，历史发展的总的方向和进程是受着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必然的，但也不排除包括个人的性格等等偶然性的作用，并且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也就是通过很多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这种辩证的又是唯物的历史观的全部真理性，是建立在人类的全部实践和全部科学的基础上的，也是人类的全部实践和全部科学所证明了的，决不是詹姆士之流一套魔术式的诡辩所能动得分毫。

总之，詹姆士表面上攻击的是斯宾塞和亚伦等人的错误理论，而实质上“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攻击的矛头正是指向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而他所玩弄的手法，拆穿了看无非是一种“移花接木”式的偷换概念的诡辩，虽然阴险狡滑，但其实也十分拙劣。

（二）以实用主义的“偶然性”原则代替历史的必然规律性的科学原则， 来宣扬偶然产生的个别人物决定社会历史的反动观点

以上述的方式对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进行了攻击以后，第二步詹姆士就以一种“方便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原则”，来代替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原则；这就是以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偶然性”的原则，来代替肯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的规律性的科学原则，并从这种偶然性的原则出发，大肆宣扬了个人决定历史的反动观点。

上面已经提到，詹姆士认为决定社会面貌的“充分条件”，乃是“有关在个人中发生的生理学上的偶然性的事”。为了以某种方式掩盖自己的观点的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实质，实用主义者总是歪曲近代科学来为自己的反动理论作辩护。在这里，詹姆士就利用了达尔文的学说企图为自己的观点作论证。

詹姆士在《伟大人物和他们的环境》这篇演说一开始就说：“一方面是社会的进化的事实，另一方面是如达尔文所说明的动物的进化，在这两方面之间，达到一种显著的平行，这我认为从未经人注意过的”。^①接着他在歪曲地介绍了达尔文关于“变异”的学说之后，就这样论证：“伟大人物产生的原因，是在一个为社会哲学家所完全不能达到的领域内的。他必须简单地接受天才作为所给与的材料，正如达尔文接受他的自发的变异一样。对于他，也如对达尔文一样，唯一的的问题是：这些材料既经给与之后，环境是如何作用于它们，和它们是如何作用于环境的，而我肯定认为可见的环境对伟大人物的关系主要地恰恰就是如达尔文哲学中所讲的环境对‘变异’的关系。它主要地是接受或拒绝、保存或摧毁、总之是

① 《信仰意志》，第216页。

選擇了他。而一旦环境接受并保存了偉大人物，它就变得以一种完全創始的和特殊的方式在他的影响控制之下了。他就象一种酵素那样起作用，并且改变了它的結構，正如一种新的动物品种的出现，就改变了它出现的地区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平衡状态一样……同样的，偉大人物，不論他是从外面进来的如克萊武之在印度或阿伽西茲之在美国，或是土生土长的如穆罕默德或佛兰克林，都在或大或小的規模上，給先前存在的社会关系带来一种重新安排。

“因此，社会之从一个世代轉变为另一个世代，主要是直接地或間接地由于一些个人的行动或榜样，他們的天才是这样适合于当时的可接受性，或者他們的偶然的当道的地位是这样險要，以致他們就变成酵素，运动的創导者，先例或风习的創立者，敗坏的中心，或其他人物的摧毁者，这些其他人物的天赋，要是能自由發揮出来，会把社会引向另一方向”。①

这一大段話，是詹姆士关于个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的主要論点的集中表述。我們可以根据这一段話，并結合其他地方的論述，把它归結为下面的四点来加以探討：第一，是歪曲利用达尔文的学說，来論証个人决定社会历史的反动观点；第二，把决定社会历史的个别人物产生的原因，归之于一种不可知的、生物学上的“內在分子的偶然性”，从而以主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偶然性的原則，代替了历史发展規律的必然性原則；第三，又以肯定个人和环境对社会发展都有作用的貌似“公正”的“中間路綫”的伪装，来掩盖其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第四，以个人偶然占据“險要的”“当道地位”因而可以发生重大作用的論点，来为个人决定历史的观点再作辯护。下面我們就来逐点加以揭露和駁斥。

1. 对达尔文学說的歪曲利用

我們看到，詹姆士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原則”和他的这一套理論，是自以为建立在达尔文的科学的基础上的。例如，首先，凭什么說社会历史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个人的作用呢？詹姆士所根据的主要理由，就是达尔文所闡述的生物界情况的比附，如他所說：“正如一种新的动物品种的出现，就改变它出现的地区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平衡状态一样”。其次，詹姆士又凭什么肯定偉大人物的产生的原因是完全不可知的，偶然的呢？他的唯一的理由也就是生物界的情形的比附，即达尔文关于“变異”的学說。詹姆士认为达尔文的“第一个成就”，就在于“表明这些由直接的适应所产生的变化（指生物体构造的变化——笔者）之完全无关宏旨，而无比地巨大得多的变化是由內在的分子的偶然性所产生的，而对此我們毫无所知”②。

这里，首先必須揭露，詹姆士对于达尔文的学說，完全是一种歪曲的利用，根本不是正确地依据科学的成果来作出哲学上的結論。实用主义者实际上是反科学的，但是他們都把自己装扮成“尊重科学”的样子。詹姆士对于达尔文的偉大的进化論学說就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当然，达尔文的学說中还存在一些缺点，这主要的是由于他还不能自觉地运用唯物辯証法来观察自然，因而在某些論点上有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如关于“变異”的学說，本来就有着这样的缺点。达尔文认为生物的某些他所謂“不定变異”的原因是我們不知道的，他就把它叫做“偶然的变異”。达尔文的确还不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辯証法，因此过分地強調了“变異”的偶然性质。但达尔文也并不是說这种变異是沒有原因，或根本不合規律的，只

① 《信仰意志》，第225—227頁。

② 《信仰意志》，第223頁。

是其原因是我們所不知道的而已。众所周知，达尔文的进化論的重要成就，在于以大量无可辯駁的事实为依据，闡明了生物的合乎必然規律的进化发展过程，决不在于宣揚了生物的无規律的偶然的变化。而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后来自己也明明承認：“我以前把變異……說的好象是由于偶然而发生的，当然是一种不正確的說法”^①。可是詹姆士却对达尔文闡明生物进化的必然規律这一主要方面完全棄置不顧，却偏偏对达尔文已自己承認为“不正確的說法”的偶然說大加利用，来作为他整个論証的主要根据。可見詹姆士完全不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达尔文的學說，而只是歪曲地利用其中个别有缺点的、甚至是达尔文自己已承認为不正確的論点，来为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作辯护的。

其次，即使撇开詹姆士对达尔文的歪曲不談，要利用达尔文的學說来为这种个人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觀作辯护，也是完全反科学的、反动的。

达尔文的學說，本来只适用于生物界，硬把这种學說搬来解釋人类社会的現象，这就是所謂“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學說的反动性，早已受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毁灭性批判。因为人类虽然一方面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在生理等方面也受一般生物的自然規律的支配，但另一方面人又早已脫离了一般动物的状态，而是自己能够創造工具、利用工具来从事自觉的、有意識的劳动的生物，并且結成了人类社会，它和其他生物的区别已經不只是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有了本质的差别。作为社会学或如詹姆士自己所說的“社会哲学”研究对象的人，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个社会的存在，而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存在，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人。人类社会有它本身的特殊規律，决不是一般生物学上的規律所能概括或比拟的。如果硬要把人类降低为与一般动物同等的地位，硬要把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比作动物界的弱肉强食，則除了显示壟断资产阶级的兇殘本性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意义。

我們还可以具体地来看一看，詹姆士硬把生物界的情况和人类社会来比附的这种論証方式，究竟是否有一点点科学的气息。

例如，能否象詹姆士那样，认为个人对于社会历史的关系，就像一种动物的新品种对当地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关系一样呢？即使作为一种类比法来看，这在邏輯上也是比拟不倫的。因为在动物方面，他說的是动物品种，而在人这方面，他說的是个人。个体与品种，当然不能作这样的简单类比。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談，詹姆士的这种类比也是毫无科学价值的。因为各种自然現象和社会現象之間表面类似的情况是很多的，如果不是經過具体的、細密的研究，确实找出实际存在的本质上的共同点，而任意把两种表面类似的事物来作比附，就会得到荒謬的結果。正如另一个实用主义者杜威，就可以因鳥能飞、蝙蝠也能飞，而推論到蝙蝠也有鳥的特性一样，这只能是一种“方便主义”的詭辯，絲毫不能是什么科学的論証。詹姆士所用的比附，实质上和这种詭辯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即使承认一种动物新品种的出現可以对当地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发生作用，一个卓越人物的出現也可以对当时的社会发生作用，也决不能推論出这两种作用就是同样的。即使前者是决定性的作用（是否决定性的作用，这里可以存而不論），也并不能推論出后者也是决定性的作用。而詹姆士恰恰就只是凭这样的比附，得出了个人决定社会历史的結論，这就可以看出他的“論証”究竟有什么价值

① 关于达尔文的變異學說問題，參閱周建人：《达尔文主义与辯証唯物論》，載《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第84頁以下。以上引文也自周文轉引。重点是轉引者加的。

了。

2. 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之于产生特殊人物的不可知的“内在分子的偶然性”。

在上面引文中我們看到，詹姆士还用达尔文关于生物的“变异”的学说，来说明决定社会历史的特殊人物的产生，把它也归之于某种生物学上的“不可知”的“内在的分子的偶然性”，从而以偶然性的原则，代替了社会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原则。

首先必须指出，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片面地归之于某种偶然性，就是荒谬的，是错误的，反动的形而上学观点的表现。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并不否认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就曾说过：“……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历史就会具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当然本身是作为构成部分列入总的发展过程，而由其他偶然性均衡起来的。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情况，其中也包括有象起初领导运动的人们的性格那样的‘偶然’情况。”^①但是，马克思主义之承认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一定作用，和詹姆士之把偶然性看成社会历史的决定原因毫无共同之处，并且是正相对立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肯定社会发展受必然的客观规律支配的前提下，承认偶然性对社会发展的加速和延缓的作用；而相反地，我们看到，詹姆士之流是根本否认历史的必然的规律性，而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完全归之于偶然性，认为它就是“充分条件”。例如，照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后达到共产主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所决定了的，是必然的；但某一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恰恰在某一年取得胜利而不是早几年或迟几年，领导某一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恰恰是这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等等，则也取决于许多偶然的因素。但是，这些偶然的因素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却决不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总的方向和总的趋势，因为那是受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了的。并且这些偶然因素本身，也只是相对于历史发展的总的必然规律来说，是偶然的，却不是說它們的产生是没有任何客观原因的，或完全不可知的，神秘莫测的。正是从这种全面的辩证法的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既能对全部以往的历史作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又能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总趋势有科学的预见，同时又与任何历史的宿命论观点划清了界线。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才能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依据社会发展本身的必然规律去争取人类的美好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同时也不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些暂时的、局部的、偶然事件面前惊慌失措。例如，象南斯拉夫这样一个本来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由于其领导人的叛卖了社会主义事业而使资本主义暂时复辟，这在整个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中也是可能发生的，因此也用不着惊慌或奇怪。但这种局部的、暂时的、偶然的事件决不能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方向，也丝毫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规律有任何动摇。而毋宁說，历史将証明，不論是铁托也好，或任何其他人也好，即使由于某些偶然的原因而使历史局部地、暂时地延缓了发展甚至产生了某种倒退现象，但毕竟不能改变世界历史的总的方向。这就恰恰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能动摇的，偶然性只能对历史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却决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总的进

① 马克思：《1871年4月17日致留·库格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485页。

程。相反地，如果照詹姆士之流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及其走狗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观点看来，则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根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而完全是受偶然性的支配，并且认为这种偶然性是完全不可知的，这就完全取消了一切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存在的可能性，对任何社会历史现象都根本无法作出科学的说明，自然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未来进程作科学的预见了。这种观点，就思想方法上说，是根本不懂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由于片面地强调了偶然性，就抹煞了必然性，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表现；而就其思想根源和社会作用来说，则归根结底是由于反动没落的垄断资产阶级，因为害怕注定本身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就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来否认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必然性，是完全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而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反动观点。

其次，詹姆士把社会历史的决定原因，归之于某种生物学上的“内在的分子的偶然性”，更是极其荒谬的。詹姆士不仅一般地把社会历史的决定原因归之于偶然性，而且特别把它归之于某种生物学上的“不可知”的“内在的分子的偶然性”，这是他自诩首先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得意之作”，而这也恰恰最足以显出他的观点的荒谬绝伦。我们已指出，詹姆士对达尔文的学说，其实是故意作了歪曲的，并且达尔文的学说本身也是有缺点的。即使达尔文关于“变异”的学说完全正确，它至多也只能用来说明一个生理上较人优越的人的产生。但一个对社会历史有影响的卓越人物之所以卓越，其意义是社会的，而不是生理的，一个生理上有某种比人优越条件的人，并不就是或一定能成为社会上的伟大人物。例如，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从来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难道就因为以往从来没有一个人在生理条件上比马克思更优越的吗？或者难道能说马克思之所以创造出促进全部人类历史的伟大变革的学说，而成为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仅仅是因为他的头脑比任何人都发达吗？这些，只要不是反动阶级的阶级偏见蒙蔽了眼睛，本来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常识。而詹姆士却硬要颠倒黑白，在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同时，又根本否认社会环境对造成伟大人物的决定作用，把产生社会上有伟大作用的个别人物的原因，归之于生理上的“内在分子的偶然性”，而把这种偶然性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除了实用主义者那种只要对垄断资产阶级“有用”就是“真理”的标准之外，能在什么意义之下说它有一点点“科学”的“真理”的气息呢？

3. 以“中间路线”的伪装，掩盖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

詹姆士本来明明是宣扬这种“内在分子的偶然性”产生的个人决定整个社会环境的观点的，但他为了掩盖自己的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又玩弄了实用主义者所惯用的另一种手法，以超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中间路线”的面貌出现。例如在上面的引文中，詹姆士就表示他似乎并不否认环境对伟大人物也有作用，这就是“接受或拒绝、保存或摧毁，总之是选择”的作用。在这篇演说稿的另一个地方，他甚至还这样说：“因此社会的进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个人……第二方面是社会环境……两种因素对于变化都是主要的。没有个人的冲动，社会就呆滞了。而没有社会的同情，这冲动就消灭了。”^①看来詹姆士似乎是既承认个人的作用，也承认社会环境的作用，并且说两者都是“主要的”“因素”，他就以此来企图表现自己是很“全面”，很“公正”的。那么说他是

① 《信仰意志》第232页。

只承认个人决定社会历史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是否冤枉了他呢？

首先必须指出；就整个实用主义的哲学来看，如詹姆士就把自己的哲学叫做“激进的經驗主义”，他根本不承认在个人的直接經驗之外有什么独立不依于人的意識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因此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我論”。他的所謂“环境”，实际上只是个人主观經驗中的“情境”，而并不是离开人的意識而独立存在的。实用主义的整个世界觀，和馬赫主义一样，只是伪装成“第三条路綫”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一点是馬克思主义文献中早已揭露得很清楚的了，在这里用不着再細說。即使就詹姆士在这里所提出的观点来看，他的观点也只是一种貌似“全面”、“公正”的伪装，实际上只是彻头彻尾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因为单就上面的引文来看，他就說“沒有个人的冲动，社会就呆滯了”，这样显然就是肯定个人——当然是指个人的精神的作用而不是指个人的物质存在——是主动的、积极的方面，是决定的方面，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环境只是被动的、消极的，被决定的方面，是第二性的。这显然就是主观唯心主义。而更明显的是，詹姆士根本把对于某一个人有“选择”等作用的“环境”，仍旧解釋为一种先前的其他个人造成的結果。他說：“值得注意的是：使某一特定的天才現在和他的环境不能相容的，通常是这样的事实：即某一在前的属于不同傾向的天才，已經使社会偏离他可能起作用的范圍。”^①由此可見：如果說环境也可以对个人有作用，而这环境又仍旧是先前的个人造成的結果，因此照詹姆士的观点看来归根到底只是个人决定环境，这还有什么疑問嗎？

但在这里，还必须进一步指出，即使詹姆士所說的“环境”不是指主观情境而是客观存在，即使真如他表面所說的“社会环境”和“个人”是“相互作用”的，并且“两种因素对于变化都是主要的”，也仍旧絲毫不能說明他的观点不是历史唯心主义。因为首先，詹姆士所說的“环境”或“社会环境”实际上是个意义极不确定、空泛而含糊的概念，根本是不科学的。如果說在一定意义下它实际上在某些地方就是指构成社会的人羣，則这种观点也是掩盖了自有文明的历史以来人类社会就分成階級的事实，这就决定了它决不能科学地、唯物主义地說明社会历史。只有如馬克思主义那样如实地肯定“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即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都是階級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才是說明社会历史的唯一科学的出发点。毛澤东同志說得好：“階級斗争，一些階級胜利了，一些階級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釋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②全部历史事实无可辯駁地証实了这一馬克思主义的論断。只有首先把人民羣众看成是历史的主体，把全部历史看成首先是人民羣众反对各种剝削、压迫階級的階級斗争、或革命的批判的實踐的历史，才有可能如实地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規律，对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說明。而作为壟断資產階級辯護士的詹姆士，則即使說“社会环境”对“历史变化”也是一种“主要的”“因素”，也是用一种抽象的、含糊的、“超階級”的观点，掩盖了历史的真相，而反对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其次，詹姆士所說的这种“社会环境”和“个人”“相互作用”的观点，即使不說是貌似“公正”的伪装，也仍旧只能是不分主次的、无原則的“方便主义”的詭辯，或把相

① 《信仰意志》，第230頁。

② 《毛澤东选集》第四卷，第1491頁。

对主义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是和历史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正相对立的。归根结底，如果否认了人民群众是决定全部历史变化的总进程的**唯一**力量，是历史的**唯一**主体，就是宣扬个人可以任意决定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因此不论詹姆士玩弄怎样的遁辞和伪装“公正”的狡诈手法，都不能掩盖他的观点的反科学、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实质。

4. 以偶然的“险要的当道地位”的观点为个人决定历史的观点再作辩护。

最后，詹姆士在宣扬个人决定社会历史的观点时还运用了另一个“论据”，这就是认为：因为个人偶然地占据了“险要的”“当道地位”，因此就能对历史起决定作用。他在上述的引文中也已经提出了这一论点，而在《个人的重要性》一文中，又特别发挥了这一论点。

詹姆士的《伟大人物和他们的环境》这篇演说发表之后，上述的亚伦曾经写了《天才的产生》一文来加以反驳，詹姆士的《个人的重要性》一文就是答复亚伦的这一反驳的。照詹姆士转述亚伦的主要论点，是说一个民族的伟大人物，比一般人的水平即使高些，也是相差不多的，完全可以略而不计；正如我们计算机车的动力时，完全可以忽略其中单独一块较好的煤所多发出的一点热力一样。詹姆士对此的反驳，主要是说：个人的这一点区别，可能很小，但是因所占的地位不同，所以很重要，正如“一寸”就量来说是很小的，但这“一寸”若多在一个人的鼻子上，就显得很突出、很重要一样。个人的特点即使很小，但因为占据了“险要的”“当道地位”，就可以发生很重大的作用。

詹姆士就想拿这样一套理论，来作为他所主张的“英雄崇拜”的理论根据，也就是想为他的个人决定历史的反动观点再作辩护。但这也只能是徒劳的。个人若占据了“险要地位”，就可以发生很重大的作用，这本来无可否认。但这丝毫也不能证明就是个人决定历史。这里的主要关键在于个人所占据的“险要地位”是怎样造成的，个人是否可以任意造成这样的“险要”地位，以及是否任何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占据这样的“险要地位”。其实，这种“险要地位”的造成，决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偶然的任意的行动；而什么样的人能在某种条件下处在这样的“险要地位”，也不是由任何人随意决定的。这些都是出于社会发展客观过程本身的必然性，归根结底是由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一定历史阶段上阶级斗争的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其他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并且，即使某一个人由于各种原因而占据了一个“险要地位”，如果他要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任意改变历史的进程，到头来也只有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就是最近、也是最显著的例子。总之，詹姆士的这种论调，除了进一步暴露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的反科学性和反动性之外，并不能为他的理论增加分毫有价值的论据。

(三)以或多或少不同的方式，恢复并宣扬历史的宿命论

在用偷换概念的诡辩手段，借攻击某种宿命论而实际上攻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并用实用主义、方便主义的“无原则”的“原则”，代替了真正的科学原则之后，詹姆士在第三步就以或多或少不同的方式实质上恢复并宣扬了他自己所攻击的宿命论。

詹姆士在《伟大人物和他们的环境》一文中，曾作为“结论”提出说：“历史的进化观点，当它否定个人创始性的极端重要性时，则是一种完全空洞的而且不科学的概念，是从近

代的科学的决定論，陷入了最古老的东方的宿命論”。①又在《个人的重要性》一文的末尾，他也說：“在我这方面，我不得不把当代社会学学派关于平均数、一般規律和前定的傾向的議論，以及它的必須低估个人的区别的重要性的观点，看作是最有害、最不道德的一种宿命論。”②可見詹姆士是自命为站在“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而且是“道德的”立場，来反对那“古老的”、“东方的”、“不科学的”而且“不道德的”“宿命論”的。但是，只要稍加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到，这位掛羊头卖狗肉的“科学家”和“道德家”所宣揚的，恰恰就是他表面所攻击的那种反科学的、最有害的、最不道德的宿命論。

我們知道，如果一种观点，只是片面地強調客观規律的必然性而否定了偶然性的作用，把必然性絕對化，則确是会导致宿命論的。但决定論本身并不就是宿命論，因为真正科学的决定論并不排除偶然性，而且相反地肯定必然性正是通过許多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可是詹姆士恰恰是以反对“宿命論”为借口而根本否定了“历史的規律性”，也就是根本否定了科学的决定論本身。这样一来，全部历史就被看成完全受偶然性的支配，也就变成完全不能对它作科学的說明，更談不上科学的預見的东西了。这就恰恰是从根本上取消了科学，而为宿命論的信仰或宗教迷信大开了方便之門。片面地只肯定偶然性的观点，也和片面地只肯定必然性的观点一样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并且同样会陷于宿命論的。事实上，如我們所看到的，詹姆士在否定了历史的規律性之后，就把历史看作是由一些特殊的个人所决定的，而这种个人产生的原因，又被归之于生理上的“內在分子的偶然性”，并且，他十分強調地指出，这种偶然性是“完全不可知”的，“是在一个为社会哲学家所完全不能达到的領域內的”③。这样，詹姆士就把人們引进了一个“不可知”的、作为“社会哲学家”所“完全不能达到的領域”，这个領域不是別的，正是宗教。因为既然这是不可知的領域，我們对它就完全不能作理智上的探求，而只能凭信仰。（附帶可以指出，詹姆士把他討論这个問題的文章，收入以《信仰意志》为名的論文集中，也决非偶然。）决定历史命运的偉大人物产生的原因，既然是不可知的，那么就讓我們放棄对它作出任何科学的、理性的說明的企图，而“虔誠”地相信他是出于上帝的恩賜吧！如果說有一种观点叫做宿命論，則正好就是这种观点。誠然詹姆士在我們所討論的两篇文章中並沒有直接地、正面地提出上帝来，但这当然絲毫不影响問題的实质。而在別处，詹姆士也确确实实是如列宁所指出，为了“实践”的目的，并且仅仅为了“实践”，就很容易推出上帝来的。因此，宣揚宿命論、宣揚宗教迷信和僧侶主义，就是詹姆士的这种反动理論的最后归宿，也是全部实用主义理論的最終目的。而这种理論的全部反科学性和反动性至此也就彻底暴露了。

現在就來讓 我們看看詹姆士这种宿命論是多么“科学”、多么“道德”、多么“进步”、多么“有益”吧！

通过这篇在美国“最高学府”、大学讲坛上的“演說”，詹姆士这位达尔文的“科学”的“信徒”实际上是以神甫的身份在向世人“傳道”：“你們，摩根、洛克菲勒和你們的少爷小姐們，感謝上帝的恩德，在你們的父精母血中安排了这样的‘內在分子的偶然性’，而

① 《信仰意志》第245頁。

② 《信仰意志》第201—262頁。

③ 《信仰意志》第225—226頁。

使你們出生在亿万富翁之家，占据了社会上‘險要的’、‘当道的’地位，你們就去随心所欲地安排这个世界罢！全部历史就是由你們去創造的！如果有‘其他人物’想来‘把社会引向另一方向’，你們就随心所欲地去把他們‘摧毁’吧！”然后轉过身来又说：“而你們、工人、农民、小职员、黑人、印第安人和一切殖民地的人們，既然上帝的意志通过‘內在分子的偶然性’使你們出生在貧穷之家和落后地区，那么就該安份守己，敬畏上帝。你們對你們所处的地位不滿意、对这个社会不滿意嗎？那么更虔誠地去祈禱上帝吧！并且耐心地等待‘內在分子的偶然性’产生出一位‘救世主’，来改变这个世界吧！除此之外，別的道路是没有的。千万不要听那些唯物主义、无神論者的話，相信有什么資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規律，跟他們去鬧什么社会革命或民族革命！”这就是詹姆士所实际要說而又吞吞吐吐不敢明說的全部真心話。它的“科学”性就在于根本否定社会历史发展規律的可知性而宣揚最古老的蒙昧主义；它的“道德”意义就在于为一小撮壟断資產阶级分子压榨、掠夺全世界被剝削被压迫人民的政策作辯护，使全世界人民俯首貼耳地忍受自己受損害乃至受屠杀的命运。它对摩根們、洛克菲勒們确是“有益”的、但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几的被压迫人民來說則只能是“最最有害”的。如果它也很“摩登”的話，則只在于它使古代芝諾們、皮朗們、馬可·奧萊留們、奧古斯丁們披上了十九世紀的达尔文們的外衣，并且不再是侍奉那古老的、过时了的貴族奴隶主和野蛮的封建主們，而是侍奉那些懂得了不用戈矛而用飞机大砲、不用火堆而用电椅来杀人的“文明”的“时髦”的奴隶主而已。

总之，詹姆士的这整套理論，不管他披上什么“科学”的外衣，玩弄什么詭辯的手法，拆穿了看，无非是为帝国主义壟断資產阶级压迫、剝削本国劳动人民和侵略、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反动政策服务的一种辯护論。它一方面为壟断資產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窃据要津、任意宰割和奴役劳动人民提供理論根据，另一方面則企图以此来麻痺受压迫、被奴役的人們的反抗意志。如詹姆士就公然說：“如果某一个叫做克萊武（Bob Clive）的孩子，如他自己嘗試过那样，在馬德拉斯把自己打死了，英国在今天会象它現在那样有这种‘帝国’的理想嗎？”^①，这就是企图把象英帝国主义整个殖民政策所造成的对印度的几百年統治，都归因于叫做克萊武的“某一个孩子”，从而企图轉移殖民地人民的視線，麻痺他們的斗志，而为整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根源打掩护。而这套理論的最主要的反动作用，則在于直接反对馬克思主义和維護腐朽反动的帝国主义制度。因为如果照詹姆士之流所說的那样，历史的发展，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生和消灭，都不是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規律，而是由于偶然地产生的个别特殊人物的作用，那末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关于資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規律就沒有根据，而只要有若干占据“險要地位”的“英雄”，就可以維持資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制度“永垂不朽”，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来“消灭”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或把世界历史“引向”他們所希望的“另一方向”；只要几个“大人物”或“大国首脑”的“会談”，就可以决定世界历史的命运了。这种理論之所以在今日还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現代修正主义者所运用，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当然，他們这种幻想，在历史发展的铁的規律性面前，必然会象肥皂泡一样立刻破灭。不論詹姆士或其徒子徒孙都休想靠这样一套詭辯，改变得了那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历史发展規律。

① 《信仰意志》，第228頁。